

# 殷周时期青铜调色器小议

## ——器座说质疑

梁彦民 陕西历史博物馆 副研究员



图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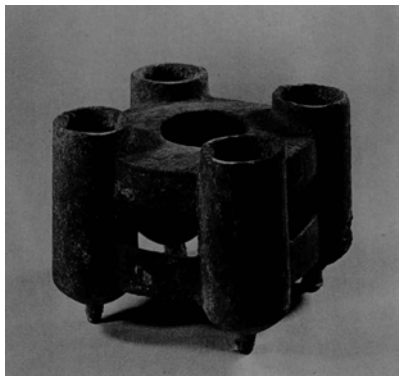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

殷周青铜器中有一类形制奇特的器物，一般认为这是一种古代用来调颜料的器物，称为调色器。如图1是1966年12月在岐山县贺家村西周墓葬中出土的调色器，通高15厘米<sup>[1]</sup>。这是件方体的器物，空腔，中部有一圆孔上下贯通，四角各连一圆筒形器，圆筒下部为乳状实心足。器前连接一昂首兽头。器身左右各有一个半环状的耳，上部装饰着兽头。

类似的器物在青铜器中还有一些发现，这些器物在形式上虽然有一些差别，但其共同点是非常明显的。

图2是1972年安阳殷墟AGM82商墓出土的，高7.2厘米<sup>[2]</sup>。与贺家村的相比，器体相同，只是四壁中空且没有双耳及前部的兽头装饰。

图3是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品，高16厘米<sup>[3]</sup>。器体与贺家村器相同，没有双耳，在贺家村器双耳处为兽头装饰，前部也有高昂的兽头。此器器体满饰龙纹，并且在上部圆孔周围均匀分布着四个半环状小钮。

图4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，高8.3厘米<sup>[4]</sup>。器体与贺家村器相同，前无兽头装饰，耳为半环状。

以上四器器体大致相同，四角皆连四圆筒，中部有上下贯通的大圆孔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四壁及三筒的调色器发现。

图5是1993年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出土的，高15.5厘米。没有四壁，四角四管由十字连接管相连，十字正中有一双面人，两耳宽大，



图3



图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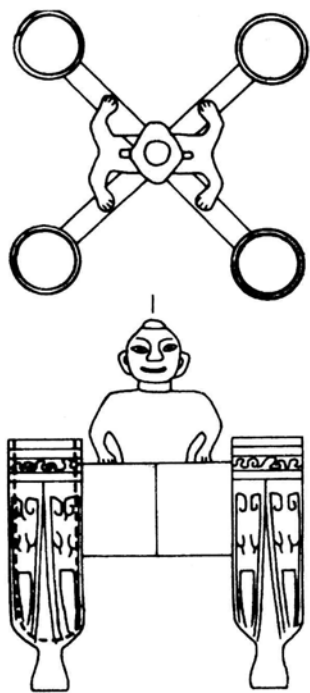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

鼻梁宽高，头顶似戴小圆帽或盘发，两双手分别置于四筒的连接臂上，作支撑状。四个管壁上均饰阴刻线纹。自双面人头顶正中至器底也有一个贯串的小孔。出土时管内有朽木，残高5厘米<sup>[5]</sup>。

图6为故宫博物院藏品<sup>[6]</sup>，通高7.5厘米。三角形，只有三个圆筒，器壁有半环形璽。圆筒上有蝉纹、蕉叶纹，有铭文“乍且戊”三字。有人考证纹饰及铭文是后人伪刻的<sup>[7]</sup>。

除上述几件外，广州文物商店还曾收藏一件，形制与贺家村器基本相同<sup>[8]</sup>。国外收藏更多，有学者曾做过介绍<sup>[9]</sup>，这里不再一一列举。

《文物》1999年3期发表过一篇俞凉亘先生的文章《铜四足器座小议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俞先生根据洛阳林校之器（图5）管内残存朽木，且“朽木的直径等于管的内径，与同出的3件铜铙残存的木柄朽痕一致。”因而认定“洛阳林校出土的这件应确定为器座。”对一直认为这类器物为“调色器”的说法提出了异议。

我们认为，仅凭管内残存朽木这一点来推翻“调色器”之说，根据似嫌不足。“调色器”之名称，绝非前辈学者的凭空臆测，而是有许多事实作为依据的。

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，李济在主持殷墟发掘的时候，就曾发现过用来调配颜料用的石制和陶制调色器。图7为一件陶

器，器高约8厘米，整体为圆形，有圈足。中部共有六个圆形孔洞，中心的孔洞透底。出土时在围绕中心孔洞的周围五个孔洞内沉淀有黄色、绿色以及白色的各种颜料。李济认为“这样特种的容器显然是作颜料碟用的”<sup>[10]</sup>。

图8是50年代大司空村发现的，高度约7.4厘米，圆形，中部有两个并列的孔洞，发掘者认为“也应是调色之器”<sup>[11]</sup>。

以上两件虽然都是陶制的，但从器物整体造型来看，与青铜调色器有很多一致的地方，说其用途与青铜调色器相同应当还是恰当的。

另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，就是在许多青铜调色器中都残留有颜料的沉淀物。贺家村器，“出土时，器内留存矿物粉末”<sup>[12]</sup>；故宫藏品，“在器物的长筒内还遗留着不同的颜色。”<sup>[13]</sup>更为可贵的是，牛津大学还曾对一件国外收藏的调色器中残存的颜料做过分析，得出“白色物为氧化，或炭化钙；黑色物为碳黑，或石墨；红色物为氧化铁；绿色物为铜矿的混合物。”<sup>[14]</sup>的结论。

再看器座说。这种器物一般较小，从七、八厘米到十几厘米，在我们举出的标本中，最大的一件为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品，高度也只有十六厘米。作为器座，显然小了一些。尤其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品上，不但满饰花纹，而且在上部还有四个半环形的小钮，如果是器座，显然不会有这种设

计。

当然，对于洛阳林校出土的调色器，为什么会在颜料筒上残留朽木的问题，在没有更多、更准确的材料发现之前，我们不能妄下断语。但正如前面所言，仅凭这一点否定“调色器”的定名，根据稍嫌不足。

从现有的材料来看，青铜调色器出现在殷墟至西周早期。西周早期之后，在考古工作中还没有发现过类似形制的器物。

注释：

[1] 长水：《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》，《文物》1972年6期。

[2] 《河南省出土商周青铜器》编辑组：《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（一）》，图版200，文物出版社，1981年。

[3]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辑：《海外遗珍（一）》图版73，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，1996年。

[4] 同上，（二），图版84。

[5]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：《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》，《文物》1999年3期。

[6] [7] 王文昶：《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9年1期。

[8] [12]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：《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（一）》，图版一五八说明，文物出版社，

1979年。

[9] [14] 汪涛：《商代考古中的颜色》，见李伯谦编《商文化论集（上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442—451页。

[10] 李济：《殷墟器物甲编陶器：上辑》62页，台湾南港，1956年。

[11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：《殷墟的发现与研究》245页，科学出版社，1994年。

[13] 梓溪：《青铜器名辞解说（十一）》，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8年11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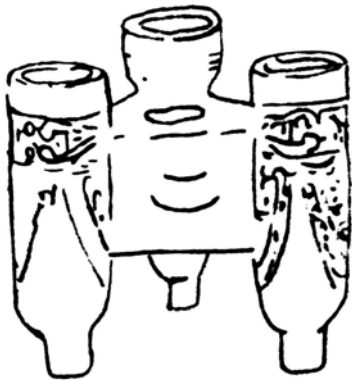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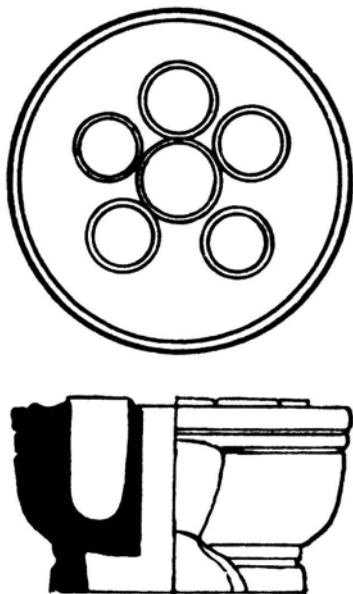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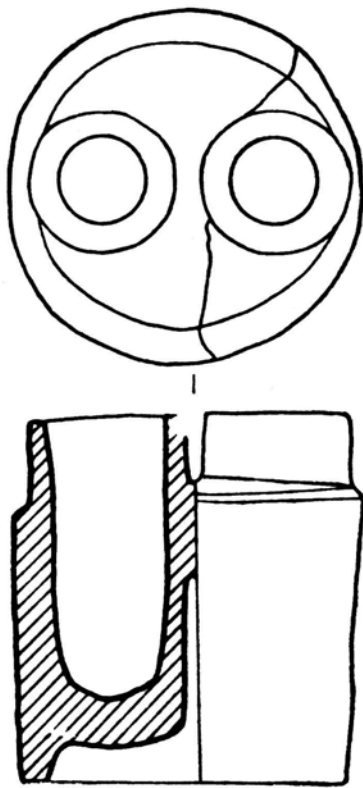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